

## 吴北江先生传略

王 维 庭

先生名闾生，字北江，桐城吴氏。清季有首倡改革学制，为北京大学最早之奠基人；重振方、姚宗风，以古文辞名天下；教泽广被燕冀，北方学者尊为大宗师，皆曰吴先生者，即先生之父也。

先生幼承家学，天资英敏，童子时下笔为文有奇气。新城王晋卿先生见之，叹为奇才，曰吾老友挚甫有后矣！

桐城文为天下大宗，自方、姚始；方、姚之文，梅伯言承之；曾涤生获交于梅先生，尽得其笔势之美，又益之以汉赋之气体，典丽雄奇，遂远出方、姚、梅三先生之上。

挚甫公与廉卿先生同受曾氏之传，有所承，又有所变，同时为保定莲池书院大师。贺松坡先生承曾、张、吴三先生之学，“而矜练生创，不蹈袭前辈蹊径，独树一宗，不为所掩，盖继三先生之后，卓然为一大宗，非余人所能及也。”（先生所著《贺先生文集序》）

先生从松坡先生受学，为文合韩非、司马子长、韩退之、王介甫为一体，雄奇峭厉、为曾、张、吴、贺四先生之后劲。当时海内之治古文辞者，多以先生为宗也。

先生平生不乐仕进，以讲学著书为乐。先后入徐世昌、段祺瑞、黎元洪幕府。论者多谓先生以命世高文而作幕府应世之文为可惜。只未知当军阀混战之际，先生以作幕为隐，利其禄入购书，且以其间隙讲学著书，收天下英才而教之，藉以承曾、张、吴、贺四先生之宗风为大任。

先生于一九二八年受张汉卿先生之聘渡辽，为沈阳萃升书院诸生讲授古文辞与唐宋诗，东北之文风由是丕变。甫满二载，日寇入侵，辽沈陷落，絃歌中辍，惜哉！

从先生受学者，尤爱先生之诵诗文。诵之入神之际眉头飞扬，笑容可掬，声音变化，千回百折之态，若现于空际。听之者神凝形释，文章内涵之秘，不待讲说而自明，盖“因声求气”之说也。由是裁成者众，异能之士日萃于其门。门下士，若曾履川，若吴稚鹤，若潘伯鹰及贺孔才，皆一时之选也。

先生所著书，有《诗义会通》四卷（有民国十六年北京文学社刊本）；《定本尚书大义》四卷，附《古文伪书考》、《书序考证》（挚甫公口述），（有民国三十年清苑郭氏铅印本）；《尚书衍义》，不分卷（系民国十九年在沈阳萃升书院讲义，有书院铅印本）；《诗义会通》四卷（也系民国十九年在萃升书院讲义，有书院铅印本）；《左传微》十二卷（有民国十二年文学社刊本，王级曾为之作《集释》，有稿本）；《左传文法读本》六卷（此为先生与刘宗尧先生合著，有民国某年铅印本）；《孟子文法读本》七卷（先生作《评点》，高阆仙先生作《集释》，有民国二年京师群铸一社石印本）；《古文范》四卷（有民国十六年文学社刊本）；《汉碑文范》四卷（附编一卷，有民国十五年武强贺氏刊本）；《吉金文录》四卷（先生作《集释》，邢赞亭先生校定，有民国某年南宫邢氏刊本）；《萃升文选》九卷（此系萃升书院讲义文学，有民国十九年书院铅印本）；《古今体诗约选》三卷（此系先生评选，高阆仙先生作《集释》者，有民国二年国群铸一社铅印本）；《晚清四十家诗钞》三卷（有民国十二年文学社朱印本）。

值挚甫公晚岁至日本考察学制之际，先生亦游学日本，通日文，所译书有《和文释例》，《支那国学论》，《学校管理术》，《东瀛战士策》，《哥萨克东方征略史》，《西史通释》，《克

策武赫斯丁列传》，《近世外交史》，《理财学讲义》，《法律学教科书》，《经济学》，共若干卷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先生隐居著书，所著有《桐城吴挚甫先生年谱》若干卷（有天津某书局某年印本），《文史甄微》二卷（有稿本，未付印）。先生绝笔于《文史甄微》，时年已七十岁矣！

先生所为诗，合李长吉、苏子瞻与黄山谷为一体，奇肆俊逸；古体逼近少陵。

先生所为文，多奇识。《原天》谓理有时而爽，曰“必有时而爽，而后理始完也”。先生盖谓宇宙之变无穷，故理之无爽者，过其时则爽矣。然爽之极必变，变而后理始完也。先生之意，以为治学以求理，理之变化无穷，则治学之变化亦无穷。先生未尝致力于辩证法之研究，而此文所云，则已具有自发之辩证法因素。先生早年之作，已具此特识，其识量亦远矣！

先生所著《释气》，以汉赋之气体为文，辞采缤纷，文气激荡，笔力盘折，盖善学杨子云《解嘲》与班孟坚《答宾戏》以及韩退之《进学解》者。然此调不变，久则生厌。挚甫公评云：“此等文体，已陈陈相因，不宜再袭。”盖谓文体久而不变，虽工亦令人生厌。然古文辞则不能变为时文八股也。

“五四”以后，古典文一变而为语体文，盖有不得不变之势也。以古典文与语体文较，古典文难学；语体文易入而又便于应世。语体文既便于应世，于斯时也，若必教人人皆为古典文，则悖矣！然治西学者，必学英文，治佛学者，必学梵文，此人人所知也。设有志于深研中夏古典籍与古文化，而不深通古典文，则如探宝名山，迷其途径，必一无所获。于是时也，而禁人学古典文，则惑矣！名书家启功先生于北京师范大学特开习作古典文专业，非无故也。

以艺观之，语体文盛行之后，古典文与古文辞仍不可废；如魏晋以降，草书与行楷盛行，然仍不能废周秦以来之钟鼎与篆隶；

又如话剧盛行之后，亦仍不能废风靡海内外之京剧也。姚姬传云：“夫文无所谓古今，惟其当而已。”“五四”以后崇新厌故之人，痛诋古典文，尤痛诋桐城之古文辞，斥之曰“谬种”；然白话诗盛行之后，仍不能废古体诗与律诗。且鲁迅为“五四”以来之启蒙大师，却尤喜作律诗；而今人不怪鲁迅作律诗，而怪太炎作古文，更怪曾、张、吴、贺之后犹有英才奔走于先生之门，敝一生之精力而学作古文辞者，何耶？

继鲁迅之后而为文坛巨子者，如叶圣陶、朱佩弦、俞平伯等，皆以作新诗而为后学倡，而晚岁却又回归于作旧诗；方今艺林宗师钱默存氏著《谈艺录》与《管锥编》，其两书皆以文言写之，然亦未妨其风行海内。而《谈艺录》又只谈古典诗，而不及新诗，何耶？是默存之深于艺也。盖亦艺术之美，尤贵具涵蕴无穷与玩味不尽；而文言文与古律诗，则更兼有词采渊雅、音节变化之特色。此等之美，岂能以去今久远而废之乎？窃以为即再历千百代后，亦不能废风雅、楚辞、两汉辞赋及乐府、唐宋文章及诗词；亦如不能废张伯英、钟元常与王羲之之书法然。此皆可断言者也。若以为此等皆不足宝，而西人何以重金求之、盗之？彼欲纳之入于艺术文化之宝库，而惟恐其不可得也。是故文言文之于今日，虽早已失其为应世之用矣；然仍不失其为永恒之艺术之美也。方今不仅大学文学系之本科生、硕士生乃至博士生，设有学习与研究文言文与古典诗词之专业；即如中、小学之语文课本，亦皆选有文言文与古典诗词之教材。何为其然也？盖欲使炎黄子孙世代诵习吾先人之艺术瑰宝，培育长养吾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之美德，使与天地兮并寿，与日月兮同光焉。亦诚如杜子美之诗所云：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也已。

先生《送郭庐扬游日本序》云：“日本，兄弟之国也。忌者顾搆之曰：‘若何亲日本？’呜乎！使日本有睚眦中国之心，犹当有所劫而不能患，不若其它之亟也；况在其相成也。”先生盖

谓即使日本侵略中国，中国人民必上下一心以抗击之，使侵略者不得其逞。中日两国终将能捐弃怨仇，共发睦邻互助之美德，故曰“相成”也。然中日各行其制，并非兄弟之国；“兄弟”之言，不能无失也。

鲁迅诗云：“历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”“兄弟”之言，虽出之鲁迅，亦未必不可议；以其不合于事实也。圣如孔子，其言尚不能无失；鲁迅虽圣，其言岂能尽善。（一九三七年，毛泽东主席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会上，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。胡风主编之《七月》杂志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演讲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与周扬之信中又说：“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，封建主义的一面，忽略其英勇斗争，反抗地主，即民主主义的一面。”——引自一九九二年《读书》第五期郁之所写《大书小识又四则》一文）“一笑泯恩仇”，即谓中日终为睦邻友好之国，后来之事实，果如鲁迅所言。百年中世界两次大战，侵略国之凶残，未有如日本者也。此非先生之所能料；然谓中日由相仇而相成，则与鲁迅所言不谋而合也。

先生所作《汤母张宜人墓志铭》云：“张文襄以文学收集天下，天下士附依者，多显名业；宗党姻娅，攀联勾结，辄致贵盛；最下驷陋，席宠灵，居闾闾，亦不失豪富。而宜人独居穷，自勅约，事翁夫，诲六子两孙，艰难三十有三载，与诸张岸然若划海山而沟绝域，不以缓急有无通一钱、尺帛，迄没世。”先生此文极赞张宜人与张氏家族“划海山而沟绝域”之气节，正所以刺负一代盛名之张文襄，其所收皆利禄之徒也。昔韩退之为谀墓之文，为世所讥。先生《集》中，亦多酬世之作，士论惜之。如此文者，直刺张文襄而无所隐，真无愧于《春秋》之笔，其风骨尚矣！

先生《集》中，传状之作多奇文，而尤奇者，《彭嫣传》也。先生谓吴瘳公天下奇士，彭嫣娼也。然嫣鄙视所接显宦贵人，独与瘳公偕隐。天下奇女子未有如嫣者也。其识力神韵，复乎邈哉！

攀甫公尝谓：“文章之事，纬地经天，代不数人，人不数篇。”（《清史稿·文苑·吴汝纶传》）《北江先生文集》中，有《彭媪传》、有《汤母张宜人墓志铭》等文，是无愧于修辞立诚，无愧为士林宗师，无愧为名山之作矣！然谓为“代不数人”，维庭不才，不敢诬本师矣！

先生《与李右周进士论〈左传〉书》云：“左氏文章之奇，太史公远不能及。”又云：“左氏文法之奇，总其大要，约有数端：一曰逆掇，二曰横接，三曰旁溢。”其论“反射”云：“左氏之意易测耳，凡其推崇褒大者，皆必有所不足；其所肆情诋毁者，必有所深惜者也。一言以蔽之，‘正言若反’而已矣。是故齐桓、晋文、秦穆、楚庄之盛，而左氏皆有微词；至于宋襄，顾独若有所推重者。古愚子曰：‘子何以见之？’仆对曰：‘此不难知也。齐桓，五霸之盛也，今读左氏，未见其所以盛也。入国之始，灭谭灭遂，已非子小之义矣；召陵之役，起于荡舟，尤诛及隐微之论也；名为尊王，而王有间言矣；名为恤小，而小国甚病矣；救许不能，救徐不克，城濮而不果，计齐之功，不足称其业也。故假宰孔之言，以深致其讥讪之意，曰：‘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者也。’其于晋文也，则请隧之斥，仓葛之呼，介子推上下相蒙之论，仲尼以臣召君之诛，尽之矣。其于秦穆也，则曰：‘无法以遗后嗣。’其于楚也，则曰：‘暴而不戢，无德而强争诸侯’。皆各以其分以断之。而其文旁见间出，各不相袭，不如《史记》之必自为之论也。斯其所以诡也。若宋襄之霸，去四国远矣！左氏乃独惜之。若曰：‘蛮夷方张，中国不振，宋虽不量轻弱，其志固未可非也。于其军败也，则称‘亡国之余’。事虽不终，其意态抑何雄杰也！’”

二千年来，评左氏者不下千百家，其发微阐幽，揭左氏运思之深邃，行文之恢诡，以诏告后学，未有如先生之精密者也。文章为百代师者之韩退之（曾涤生有诗云：“文笔昌黎百代师。”）

其评左氏云：“浮夸”。夫“浮夸”二字，岂能尽左氏之奇哉！

先生《与藤井义雄书》云：“欲尽通中国隆古帝王之制作，与夫英贤豪杰宏伟非常之术业，则舍文章之外，其道无由；比之训诂之学，不可同日而语。”然挚甫公之为学，即“由训诂以通文辞。”挚甫公淹通经史诸子百家之书，“旁及小学音韵，皆有诠释。”（《清史稿·文苑·吴汝纶传》）盖文字声音训诂，为治学之基础。如欲深通中国之学、中国之文，不于此用力，则终不能深入也。夫通训诂者，未必皆工于文；然工于文者，必以通训诂为基础也。

先生晚岁，居敌伪盘据之危城中，群小久慕其名，欲挽之出仕。时先生正困于生计，然终不为所动。先生家世潇洒，终日默默，以治训诂为乐。抗日战争告捷，维庭还于旧京，时胶西柯先生凤荪、新城王先生晋卿早已下世，古文辞大师凋谢殆尽，独先生以七十高年不废纂述，所著《文史甄微》，于群书多发新义。杨伯峻尝采其说入于其所撰《春秋左传注》中；童藻孙撰《韩集校诠》亦曾有所摘引。其时余每晋谒，辄出斯编以相示，语及心得之际，更沈沈若有所深思。惜正值发微探幽胜义层出之际，而哲人已萎矣！

桐城古文辞之学，盛行二百余年，大名家不下十余人，再世相传知名于天下者，独姚、吴两家而已。仲实、叔节之学，信美矣！然若论著述之宏富，教泽之深远，皆不能与北江先生相比。北江先生有女孙曰鸥者，以班、蔡之姿，奋起上京，执教上庠，步入文坛，驰骋乎著作之林。吴氏三世，绳绳相继，至鸥君，逢变革开创之局，又采各家之长以自广，术业之隆，如日方升，余老耄矣，犹及见之。吾闻积厚者流光，明德之后，必有传人，岂不信哉！

作者为前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